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8年10月20日 (第179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学者：美应鼓励美中企业开展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美中贸易摩擦升级影响到全球增长的步伐，现在不能还停留在一味就自由贸易和关税争吵不休。美国应从长远角度看待美中关系，鼓励两国企业就创新开展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CSIS呼吁美加紧强化美日同盟

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但面对地区挑战以及特朗普领导美国的不确定性，美日同盟的裂缝开始出现。因此，美国应重构美日同盟，与日方联手应对共同威胁。

中美关系

外企将生产线迁出中国的难度大

《纽约时报》网站报道称，美中贸易战促使一些在华外企想要将生产线迁出中国，但要想退出中国并不容易。

由于关税以及中国工人工资水平提高，在中国的生产成本正在上升，许多在华企业正考虑将生产线转移至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等成本更低的国家。德国体育品牌彪马等在美国拥有重要业务的公司已经表示，希望将生产转移到中国之外。

然而，要退出中国并没那么简单。从夹克和牛仔裤上的拉链和铆钉，到苹果手机中使用的原材料，如今各种消费品中有许多环节是在中国制造或加工的。中国拥有稳定的工人资源，仅就制造能力而言，中国无与伦比。中国拥有庞大而快速的物流网络，有可靠的公路和铁路线，将供应商与装配厂连接到港口。相比之下，越南和柬埔寨等国家缺乏中国庞大的供应商基础和可靠物流，而且必须培训更多的工人，因此，许多公司必须从头开始。

报道援引柬埔寨服装制造商协会秘书长肯·卢 (Ken Loo) 的话称：“这不像是去商店买东西，只要去下一家商店买就可以”，“从零开始办工厂，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半时间”。

特朗普正在帮助北京赢得南海

《华盛顿邮报》网站近期登载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普兰 (Robert D. Kaplan) 的文章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帮助中国在南海取胜。

美国必须面对一个重要的事实：西太平洋不再是美国海军独

霸的水域。中国恢复大国地位，造成了复杂的多极局势。美国必须在“印太”地区为中国空军和海军力量留出一些空间。作为美国主要盟友的南海沿岸国家如越南和菲律宾，别无选择，只能与更大、经济更强、更靠近他们的中国相处。

特朗普向美国亚洲盟友所传达的不确定性比当代历任美国总统都要多。这可能迫使这些盟友与中国达成单独协议。这样的过程可能在暗地里进行，而且几乎从不出现在头版新闻里。美国有一天醒悟过来会发现，亚洲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不要认为美国可以把贸易当作在南海对抗中国的杠杆。在南海问题上，北京有切实、宏大的长期战略，而特朗普则反复无常。

除非美国希望在南海打热战，否则美国对中国“蚕食”政策的唯一盾牌就是自由贸易和民主同盟体系。权力不仅是军事和经济上的，也是道德上的。所谓的道德指的是始终如一，让盟友可以依靠。只有这样，越南和菲律宾等沿海国家才能从自身利益出发，与中国保持安全距离。

遏制中国说到容易做到难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 10 月 14 日载文称，在应对中国方面，特朗普必须争取内阁、国会两院以及美国人民的支持，这是遏制中国说到容易做到难的原因。

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中，美国副总统彭斯对中国猛烈开火，但他的演讲缺乏细节，这表明美国政府还未将对华强硬言论转化为有效、长期的外交政策。但彭斯的言论有其重要性，因为这是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关系的最新表态。演讲中没有多少能让中国领导人安心的话。如果美国继续大力妖魔化和遏制中国，中美不可能合作解决朝鲜问题。

特朗普是否会重走往届总统的老路，只是做样子而已呢？这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愿意付出多少。虽然他们已经采取了一些牵制行动，但还不足以应对中国这个庞大的地缘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内部在中国问题上还存在分歧，鸽派官员愿意忍受对华言辞强硬，但不愿支持在军事方面采取切实措施。然而，即使特朗普政府内部团结一心，准备对华采取更有力的回应，美国政治体系的其他部分如国会、选民也未必会支持激进的东亚政策。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国内扩大与中国竞争的欲望似乎在增强，至少在国会是这样。加之两党反对中国的贸易做法以及糟糕的人权记录，形成支持对华强硬的联盟至少是有可能的。不过，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强硬言论要想转化为切实的战略，需要的远不止反华团体组成的联盟，而是需要建立真实长久的国内“共识”。

美学者：美应鼓励美中企业开展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美中贸易摩擦升级影响到全球增长的步伐，现在不能还停留在一味就自由贸易和关税争吵不休。美国应从长远角度看待美中关系，鼓励两国企业就创新开展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美国 RealClearWorld 网站近期登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经济和发展政策专家希尔顿·鲁特 (Hilton Root) 的文章称，美国应从长远角度看待美中关系，鼓励两国企业就创新开展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文章摘要如下：

美中贸易摩擦升级影响到全球增长的步伐，现在不能还停留在就一味自由贸易和关税争论不休。尽管这种辩论具有重要意义，但人们还应考虑进一步鼓励美中两国企业加强交流。

纳瓦罗领导的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布报告称：

“中国的行为、政策和做法不仅威胁到美国经济，也威胁到全球创新体系。”要想衡量创新或创业并不容易，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纳瓦罗所列的证据。我们看到，在与中国企业的激烈竞争中，一些美国工厂关闭、裁员、蒙受损失。此外，美国中国商会的报告指出，至少有 20% 的商会会员对盗窃技术和限制市场准入感到担忧。

如果中国只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这些还是可控的，但中国的经济体量让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问题。美国对此所做的反应是关税一轮接一轮，中国的反应也是与之相似。中国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领导人想要发展技术，处在全球价值链的顶端，这一点值得称赞。但中国的举措的确引起了外界的担忧。

如今，美国 3560 亿美元的研发开支中 83% 以上由私人公司提供。这些公司对合作持谨慎态度，不愿自己来之不易的创新成果被中国伙伴掠夺。中国的做法也有不利的一面：今天的行动会影响未来的外商投资机会，而且很快就会导致回报递减。从长远来看，单独行动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

与其看谁能造成最大的破坏，不如鼓励更健康的思想传播。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在太平洋两岸的企业之间实现正式、友好和互利的知识产权转让。技术许可市场需要适当的受规则约束的环境来激励这种自愿传播。

一旦联盟成员显然能获得产品、机会和优势，其他成员就会加入。市场可能会惩罚那些选择待在市场之外的企业。孤立的企业就像孤立的国家一样，只能提供靠自身的努力来生产产品。最重要的是，企业可以防止竞争对手获得绝对优势。企业通过合作获得保护，免受一方因拥有另一方所缺乏的优势而发动的突然袭击。

解决当前争端的唯一持久方案是找到中国长期利益与西方

长期利益一致的领域。揪住贸易赤字不放是短视的做法，只能带来短期收益。每一方的长远利益都在于开展长期合作，这使得当前国际机构的公信力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如果我们朝着合作的方向努力，那么一个经济体在创新方面的成功可以帮助另一个经济体取得发展，进而提高两国私营活动的积极性。

美国外交

白宫的国家网络战略继续充斥着夸张言论

美国外交学会网站 10 月 8 日载文称，白宫新网络战略所用夸张手法可能造成问题。

白宫近期发布了新的国家网络战略。该文件备受诟病的一点是缺乏细节，尽管列出了美国政府将要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但它并未详细说明部门分工，也没有列出具体时间表。此外，这份文件的语气以及它对奥巴马时代网络战略的彻底背离也引人注目。特朗普政府将网络威胁称作事关美国存亡的威胁。毫无疑问，网络安全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安全议题，但是走错路的后果并没有那么严重。事实上，网络空间已经存在太多的恐惧、不确定性和疑虑，导致制定好政策的难度增加。美国政府以世界末日般的措辞描述网络安全问题毫无裨益。文件中提到的外交政策也很夸张。美国此前曾努力为网络空间的国家活动制定可预测的规则，如今这种做法被描述成里根所说的“以实力促和平”。

新战略的夸张手法把“音量”开到了最大。但这种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方法会使对手陷入困境。莫斯科和北京也可以选择将音量调到最大，从而加剧网络空间的竞争，加剧网络安全困境。

或者，他们可以对战略中的夸张说辞持怀疑态度。

美沙关系正失去控制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载文称，沙特官方可能与沙特记者卡舒吉之死脱不了干系，但遗憾的是，这可能不会彻底改变美国 and 沙特长期以来的关系。

特朗普政府讨好利雅得，异想天开地试图将其作为美国在中东战略的核心，这为沙特国王萨勒曼壮了胆，给了他一种不可战胜的感觉，让他相信鲁莽行为不会有任何后果。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沙特要为卡舒吉之死负责，或者国会施加严重压力，否则特朗普也不愿施加惩罚。

萨勒曼执政第一年最大的外交成就是成功地俘获了特朗普总统的心。沙特阿拉伯的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而特朗普对萨勒曼的支持也带来了一些回报。不过，这些回报远不及纵容萨勒曼搞砸一切带来的负面后果。过去两年里，萨勒曼推行的政策损害了美国的重要利益。尽管特朗普政府在美沙关系中投入很多，但回报很少。

开明、经验丰富、在抗拒变革的地区推行改革的领导人通常值得美国支持，而冲动鲁莽、不计后果的领导人却不值得。美国不能创造前者，但更不能赋予后者权力。特朗普政府不应忽视两者的差别。

国际影响力低下导致特朗普难推“美国优先”

《国家利益》杂志网站载文称，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显示特朗普在国外民调中的支持率堪忧，这可能导致他很难在国际

社会推行“美国优先”政策。

皮尤中心公布了在 25 个国家开展的年度全球民调，只有 27% 的人选择相信特朗普能在国际事务中明智行事。和他国领导人以及往届美国总统相比，特朗普的支持率都被甩在身后。不过，例外是特朗普在以色列的支持率高达 56%。

虽说民意调查的数据与美国利益无直接关系，但它与美国在海外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密切相关——信心指数与公众对美国的意见是正相关的。以上调查体现了其他国家及其民众是否容易被他国领导人说服。无论在地区还是在全球层面，这种说服力是领导地位的核心，能够帮助一国在海外推进本国的国家利益。

比起让中国或其他国家承担大任，皮尤调查的大多数参与者更希望由美国扮演领导者角色，但同时调查结果显示人们认为美国并没有扮演好这个角色。受欢迎与受尊重是不同的概念，但彼此相互关联，而特朗普两者皆失。

CSIS 呼吁美加紧强化美日同盟

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但面对地区挑战以及特朗普领导美国的不确定性，美日同盟的裂缝开始出现。因此，美国应重构美日同盟，与日方联手应对共同威胁。

在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背景下，由理查德·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牵头，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近期发布报告，就美国如何应对地区挑战，对美日同盟的未来走向进行评估与探讨。报告摘要如下：

报告认为，日本是美国在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两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创新的经济、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强大的军事能力，

而且在面对地区与全球性挑战时，美国与日本的利益都紧密结合。但面对地区挑战以及特朗普领导美国的不确定性，美日同盟的裂缝开始出现。

为此，报告呼吁美国应重构美日同盟，与日方联手应对共同的威胁。本报告希望能够提出一个雄心勃勃但可以实现的议程，以协助在 2030 年之前巩固美日同盟。

由于美日的诸多优势，美日同盟往往被视为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美日同盟的成功归因于其充分利用四个持久优势来承诺保护共同利益：

第一，美日在建设和平繁荣的地区和国际秩序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美国和日本共同参与建立了一个更有利和持久的战后秩序，该秩序已维持了八十多年。

第二，美日在保护人权、民主、自由市场和法治方面有相同的价值观。这些基本价值观已成为国内外的信标，加强了双方的国内体制，同时在全球吸引了朋友。

第三，美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美日同盟将全球最大的三个国家经济体中的两个联合起来，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约 30%。

第四，美日保留了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在东北亚。几十年来，美国和日本已经发展了强大的能力和关系，来阻止和抵御其共同利益所遭受的一系列威胁。

尽管上述优势为美日扩大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美日同盟还面临着一些严重的挑战。

其一，美国和日本协助创造的国际秩序处于危险之中。在外部，“威权资本主义”正在作为一种替代治理模式而传播；在内部，美国领导人质疑联盟和现有全球秩序的价值。

其二，两国领导人对共同价值观持不同意见。特朗普政府对

联盟的交易式态度和与威权主义领导人的无条件接触，让人质疑美国是否支持人权、民主、自由市场、贸易、法治等共同价值观。

其三，保护主义的幽灵正在浮现。一些国家依靠不公平的经济行为窃取美国和日本的创新成果。与此同时，特朗普正在利用民粹主义情绪实施有害的保护主义政策，特朗普政府是战后最重商的美国政府。

其四，军事竞争对手正在缩小军事力量的差距。中国进行快速的军事现代化，并采取“灰色地带”行动，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迫使美日同盟重新评估其遏制和抵御侵略的能力。

以上挑战并非无法克服，但美日需制定更清晰明确的愿景，更好地协调应对政策，必须牢记联盟的总体目标是保护共同利益。在选择潜在的举措时，美日应该关注三个要点：战略有效性、政治可持续性和资源利用率。

具体而言，报告提出四类十项举措：为加强双边经济关系，重新建立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制；为加强作战协调，从联合基地开展行动，建立联合特遣部队，建立日本联合作战指挥部，并制定联合应急计划；为促进联合技术开发，共同开发国防设备并扩大高科技合作；为扩大与地区伙伴的合作，重振三边安全合作，设立地区基础设施基金，并制定更广泛的地区经济战略。

总之，美国没有比日本更好的盟友，今天美日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在未来几十年复兴美日同盟需要艰难的决定和持续的努力。

美国政治/其他

美两党选民分歧巨大

皮尤研究中心网站近期载文称,根据最新调查,在医疗保健、移民和美国的国际角色等主要问题方面,美国共和党 and 民主党支持者的观点极为分裂。

很多数据与皮尤之前发布的报告相符,两党支持者之间的观念差异在过去十年变得更为悬殊,尤其在种族歧视和移民方面。85%的民主党选民称国家需要继续为黑人平权作出改变,而赞成的共和党选民只有 29%。两党支持者都有过半的人认为让满足一定条件的移民取得公民身份和加强边境安检同样重要。但 49%的民主党选民认为重点应放在给予公民身份上,只有 11%的共和党选民持这一观点; 39%的共和党选民认为加强边境管制更重要,只有 5%的民主党选民认同这一观点。

更多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推行的两项政策——对贸易伙伴加税和 2017 年“税改”持正面态度。78%的共和党选民支持税改法案,而民主党选民只有 11%表示支持。72%的共和党选民认为对进口商品加税对美国有利,只有 14%的民主党选民同意这一观点。

此外,85%的民主党选民认为确保每个人享受到医疗保健服务是政府的职责,相比之下,只有 24%的共和党选民这么认为。同时,在是否支持堕胎合法化,以及对美国经济体系公平性的看法方面,两党也存在显著分歧。

美媒：马蒂斯与特朗普渐行渐远是必然

Vox 网站载文称，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特朗普的冲突几乎是必然的。

如果马蒂斯离任，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中的温和派将寥寥无几。马蒂斯经常被认为是白宫里少数几个“成年人”之一，他的军事和战略知识帮助他赢得了特朗普的信任，并克制了这位总统最危险的外交政策冲动。例如，报道称马蒂斯在 2017 年 4 月阻止了特朗普下令暗杀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他还敦促特朗普坚持外交手段优先的对朝政策，而不是立即采取军事行动。

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功，马蒂斯却未能让特朗普在几个关键的外交政策问题上改变立场，包括伊朗核协议。马蒂斯和蒂勒森反对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但特朗普的意志最终胜出。马蒂斯还反对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组建太空部队，以及与美国的欧洲盟友发生贸易摩擦。但他没能说服特朗普。更糟糕的是，特朗普还把马蒂斯排除在其他重大军事决策之外，包括暂停与韩国的军事演习，以及禁止跨性别者参军。

尽管马蒂斯的任命让两党领导人如释重负，但马蒂斯和特朗普在外交政策观点上显然存在分歧，未来的冲突几乎是必然的。马蒂斯在特朗普政府的日子可能已经屈指可数了，如果他离开，本已混乱不堪的特朗普政府将更加混乱。

种族及性别歧视促使支持奥巴马的选民转向特朗普

Vox 网站 10 月 16 日载文称，一项最新研究发现，驱使曾经支持奥巴马的选民转向特朗普的真正原因是种族怨恨以及恶意的性别歧视，而非经济压力。

2016 年大选最令人困惑的一点是 2012 年投票给奥巴马的一些选民在 2016 年把票投给了特朗普，大约有 670 万到 920 万美国人这么做。鉴于 2016 年的大选结果是由 4 万张选票决定的，因此可以说，这些从奥巴马转向特朗普的选民是希拉里败选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人认为，这些选民的存在证明，对 2016 年大选结果最可信的解释是错误的——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利用美国白人的种族主义来赢得摇摆州。过去投票给黑人总统的美国白人怎么会是种族主义者呢？一项新的研究从统计学角度考察了大量从奥巴马转向特朗普的选民。调查发现，这些选民倾向于在种族敌意和仇外情绪方面得分较高，遭遇经济问题的可能性没有特别高。

该研究的作者写道：“持种族保守态度或反移民态度的白人选民转而支持特朗普的可能性高于在这些问题上持自由派观点的人。我们几乎没有发现有证据能证明，经济失调和边缘化与 2016 年的投票变化有显著关系。”

这篇分析符合过去 18 个月左右的一些列研究，其中大部分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大量证据表明，特朗普选民的动机是种族怨恨以及恶意的性别歧视，而非经济压力。

按有限政府的标准，美国哪些州长的财政政策得分高？

美国卡托研究所税务政策研究主任克里斯·爱德华兹(Chris Edwards)近期撰写报告，从有限政府的角度对美国各州州长的财政政策进行打分。报告摘要如下：

州长在一州的财政政策中起着关键作用。他们提出预算，提出税收改革建议，签署或否决税收和开支法案。当经济增长时，州长可以利用增加的收入来扩大项目，或者可以通过减税把额外

的收入返还给公民；当经济陷入停滞时，州长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来弥补预算缺口或者削减开支。

美国各州州长的财政决策正受到《2017 年减税与就业法案》的影响。州所得税税基与联邦税基具有很大关联，因此州长们一直在考虑要遵守哪些联邦改革。此外，法案规定了州和地方税的联邦税扣除额上限，增加了数百万家庭的税收负担。

本报告从有限政府的角度对各州长的财政政策进行打分评级。评分机制基于七个变量，包括两个支出变量、一个收入变量和四个税率变量。此次评分只考虑了影响各州短期预算的税收和开支措施，但没有考虑州长可能进行的长期或结构性改革，比如对州养老金计划的改革。因此，这些结果能衡量每位州长在财政上的保守程度，但不能反映州长们采取的所有财政措施。

根据七个税收和开支变量，每位州长的得分从 0 到 100 不等。接近 100 的分数表明支持小政府政策，得分最高的是那些减税和削减开支最多的州长，而得分最低的则是增税和增加开支最多的州长。数字分数转换为 A 至 F 的字母，以下五位州长获得 A：

新墨西哥州州长苏珊娜·马丁内斯(Susana Martinez)：马丁内斯担任新墨西哥州州长达 8 年。她在卡托之前的报告中得分都很高，而在这份报告中得分是最高的。马丁内斯素以反对浪费性开支而闻名，近年来她一直保持新墨西哥州的普通基金预算(general fund budget)的稳定。在税收方面，马丁内斯推行改革，譬如降低该州的公司税税率，提升了新墨西哥州的竞争力。近年来，石油行业的税收收入停滞不前，平衡州预算成为一项挑战，但马丁内斯坚决反对议会提出的增税计划。2017 年，她否决了那些要求每年增加 3.5 亿美元税收的议案。

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Henry McMaster)：自 2017 年以来，麦克马斯特开始在财政上持保守态度。他否决了

一项提高天然气税和汽车费用的议案。他还提议将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低 1 个百分点，将最高税率从 7% 降低到 6%。如果通过，该法案每年将实现超过 4 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在开支方面，麦克马斯特今年提出了一项克制的预算案。他呼吁对该州的公共养老金体系进行全面改革，以削减成本。

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布尔刚 (Doug Burgum)：布尔刚曾是科技企业家，现在是他担任州长的第一个任期。他承诺要控制开支，管理高效的政府，而不是提高税收，他目前正在履行这些承诺。几年前，北达科他州繁荣的能源行业变得萧条，州财政收入下降。布尔刚寻求依靠削减开支而不是增加税收来平衡预算。在最近的预算周期中，州政府开支削减了 5%，今年，布尔刚要求州政府机构再削减 5% 到 10% 的预算。

缅因州州长保罗·勒佩吉 (Paul LePage)：勒佩吉在其 8 年任期内一直是坚定的财政保守派。他控制了开支，削减了州政府的就业规模，改革了福利项目，并削减了税收。他经常谈到政府大型项目的负面影响。他已经降低了所得税税率，并否决了立法机构通过的许多增税议案。2017 年，勒佩吉废除了对高收入者征收的 3 个百分点附加税。在最近的预算案中，勒佩吉提议降低公司税税率，废除遗产税，把个人所得税税率从多级税率改为统一的 5.75%。

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 (Greg Abbot)：阿伯特自 2015 年开始担任得州州长，是一位财政保守主义者。得州普通基金预算近年来一直保持不变，阿伯特希望削减公司税。2015 年，他批准将该州繁重的特许经营税 (franchise tax) 削减 25%，为得州企业每年节省了 13 亿美元。在 2017 年的州情咨文中，阿伯特提议进一步减税，他表示“我们必须继续削减公司特许经营税，直到它被废除”。阿伯特还批准了一项法案，取消了对各类

专业人士的年度许可费，为得州人每年省下 1.25 亿美元。

今年的报告中，所有获得 A 的州长都是共和党人，获得 F 的 8 位州长中有 6 位是民主党人。在卡托过去的报告中，有一些得分很高的民主党人，但是共和党州长比民主党州长更倾向于关注减税和削减开支。这一点在 2018 年的报告中再次凸显。

今年的报告中，共和党州长和民主党州长的平均得分分别为 55 分和 41 分。共和党人在开支和税收方面的平均得分高于民主党，其中，共和党在税收方面的得分要高于开支方面。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